

地理学思想史

刘盛佳
编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虹

封面设计：路石

ISBN 7-5622-0597-3/K·48

定价：5.60 元

地 理 学 思 想 史

刘盛佳 编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理 学 思 想 史

刘盛佳 编著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75 字数435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22-0597-3/K·48

印数：1—2000 定价：5.60元

内 容 提 要

中 国 地 理 学 思 想 史

本书是有关地理学学术史的著作，它研究地理学基本理论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探明地理学在当今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是学习和研究地理学的必读文献。其特点：1) 古今中外贯通，但详今薄古，用比较的方法，充分论述中国地理学在古代曾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近现代尽管比世界先进国家较为落后，但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就，有了长足的进步！2) 着重介绍了近现代世界各先进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上地理学的发展水平和成就，为推动我国地理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地理系、科技读硕士、博士学位学生的教材，也可供地学各专业和与地学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工作者、教师和学生及爱好者参考阅读。

中国出版集团

Abstract

This book is a work about academic history of geography. It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origi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al basic theory,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and tendency of geography in nowadays and future. It is a obligatory document to study and research on geography. It is summed up as follows:

1. The book has a through knowledge of both the ancient and nowadays and both the foreign and China, but it stresses the present, not the past and stresses china, not the foreign. It uses comparative method to discuss that China geography was in the lead in the world in the ancient times and although China geography fell behind the west countries in the morder and comtemporary times, China geography had still reached a great achievement and had still made a great progress.

2. The book stresses to introduce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achievement of theory and prattice in the morder and contemporary times in all advanced countries of world so as to point out direction of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he book may be used as textbook by students of geographical department in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raduates and doctors and may be used as referencebook by researchers, workers, teachers, students and amateurs of all department of geoscience and relative subjects.

序

人类的地理学思想萌芽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观察。诸如天地的运行，四时的递变，河湖的涨落，生物的繁衍等等自然现象，每个原始民族都有他们的观察和解释，这类原始的地理学思想，有的保留在歌谣传说之中，有的涂抹在壁画岩画之上，往往是片断的和零碎的，绝大部分都没有能够流传下来。这类原始的地理学思想，其中有许多是错误的，它们常常和原始宗教、巫术和其他一些荒诞不经的传说纠缠在一起，但这中间也有不少正确的东西，尽管是很朴素的，却是符合科学的。

在人类有了文字以后，这些原始的地理学思想，有的就被记载了下来，而且经过后来的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的继续观察，继续认识，在原始的地理学思想的基础上，人类的地理学思想有所提高，有所发展，他们不仅观察自然界的现象，而且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在我国，例如先秦的著作《周易》（《乾》十四下）所说的“天行健”，这就是对于天地运行的规律性的记载，另一种先秦著作《越绝书》所说：“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长之，秋成而杀之，冬受而藏之”（《外传枕中》第十六），这就是对四时物候的规律性的记载。说明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先进的地理学思想。当然，中国人不会因此而骄傲，因为这类先进的地理学思想，在古代埃及、印度、两河流域以至希腊和罗马，都可以找得到相似的例子。人类对自然界的观察，从模糊走向精确，从零星片断走向完整，从表面现象的罗列走向规律性的总结，这是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都曾经经历的过程，地理学思想的发展是这样，其他一切科学思想的发展也是这样。

当然，每个民族由于他们在地球舞台上登场的时间有早晚之

别，他们所繁衍生息的地理环境彼此不同，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他们之间在地理学思想的发展上，也会出现许多差别。在中国的地理学思想发展史上，从公元4世纪之初到6世纪后期，曾经出现一个盛况空前的飞跃时期，这就是不久以前我在《地理学报》（1988年第3期）中所提出的“地理大交流”的观点。我认为，假使我们把15世纪以后的一段时期中，人们对于新航路和新大陆的探索称为“地理大发现”，那末，在上述时期中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巨大人群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上的深刻变异，应该被称为“地理大交流”。在这段时期中，大群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个部落接着一个部落地跨过被称为“万里长城”的这道汉族人所设置的防线，定居到这片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原来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汉族，被迫大批南迁，放弃了他们世代定居的这片干燥坦荡的小麦杂粮区，迁移到低洼潮湿的江南稻作区。因此，不论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数量巨大的人群，都面临着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于这些移民及其子孙，新领地为他们大开眼界，而故土仍为他们世代怀念。这就是在这个时代中人们的地理学思想所以特别活跃的原因。地理学思想空前活跃的结果，是大量地理著作的出现。我在《地理学报》上曾列举了这个时代的许多地理著作的名称，这些地理著作和先秦时代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禹贡》、《穆天子传》等很不相同，他们摆脱了先秦作者的那种漫无边际的想象和假设的陋习，而以他们的直接或间接的实践经验作为他们写作的依据，使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许多记载翔实，描述生动的地理著作。

在这个时代中，人们的地理学思想的活跃，还不仅表现在地理著作的大量出现，在其他许多非地理作品中，同样也可以看到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真挚感情和由于这种感情所激发出来的丰富多采的描述。

著名的《敕勒歌》是从鲜卑语翻译过来的民歌，歌辞说：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乐府诗集》卷八十六杂歌谣辞）

《与陈伯之书》是南梁军队中的一位幕僚丘迟所写的一封信，敦促身在北朝的将军归降的书牋，但其中却也有一段生动的地理描述：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文选》卷四十三）

以上两种都是这个时代的作品，但都不是地理著作，前者所描述的是北方草原的自然景色，后者所描述的则是江南水乡的暮春风光。何等的真切，何等的生动，不是身处其境的人，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维妙维肖的文字来的。这就是这个时期中人们地理学思想十分活跃的特征。从政治上说，这个时代是中国的混乱时代；但是从地理学思想史来说，这个时代是中国的光荣时代。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中国在先秦时代所出现的各种先进的地理学思想，并没有值得骄傲之处，因为和当时世界上已经开化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相比，我们并无特别突出的事例。但是这个时代却不同，由于地理学思想的活跃，从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地理学家，出现了大量杰出的地理著作。我在《地理学报》上已经比较详细地阐明了这种事实。我在拙作中最后指出：“在整个地理大交流时代中，在所有这些知识丰富的地理学家中，最最杰出的，无疑是北魏的郦道元，而他所撰写的名著《水经注》，正是这个时代的一切地理著作中登峰造极的作品”。郦道元在当时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我在拙作中并无评论，在这里，我愿意引用日本地理学界的元老，年逾八旬的广岛大学名誉教授米仓二郎先生今年7月28日给我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一段话（原信是用英文写的）：

“我以为郦道元是中世纪时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这是欧洲历史上所谓的黑暗时代，当时的欧洲，就连一

个杰出的地理学家也没有。从全球的观点看来，地理学史不能不提到酈道元。我希望你一定要用英文写一篇有关酈道元的论文，在某种地理刊物发表。”

〔早在米仓先生写此信前两年，我已经接受了由弗里曼教授（T.W.Freeman）主编的、在英国出版的《地理学思想史》（History of Geographical Thought）杂志的约稿，用英文撰成《酈道元生平考》（The Life of Li Daoyuan）一文，该文将在该刊1988年发表〕（三十四卷《散文》）

米仓先生把酈道元作为中世纪时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或许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当然，他在信上并没有写出酈道元在地理学思想史上具有如此崇高地位的具体理由。关于这方面，我可以为米仓先生作出补充，酈道元的地理学思想，首先是从内心深处的热爱大自然。美国学者亨利·G·施瓦茨（Henry G. Schwarz）在他所著的《徐霞客与他的早期旅行》（Bellingham, Washington: Program in East Asian Studies, Western Washington State College, Occasional Paper, No.3, 1971）中，用“中国的自然之爱”这样的标题，来描述包括酈道元、徐霞客等在内的许多中国古代学者，说明这种热爱大自然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作为一个伟大地理学家的酈道元，正是由于他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成为他毕生用心认识大自然，研究大自然，描述大自然的动机，是他所以能写出象《水经注》这样的千古杰作的思想基础。酈道元地理学思想的另一重要方面，表现在他对人和自然的关系上的正确态度。尽管在他的时代，中国已经发生过多少次可怕的水灾，黄河早已成为“一石水，六斗泥”的“悬河”，人们在滔天洪水中已经付出了难以估计的代价。但是他在《水经·巨马水注》中，却写下了“水德含和，变通在我”这样的至理名言。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在中国后世的地理学家、水利学家等之中，发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

在政治地理上，酈道元的思想也表现得十分明确和坚定。尽

管在他的时代，中国南北分裂已有一个半世纪，但是他确信西汉王朝的版图，应该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国的版图。所以虽然他的足迹绝未到达江南，却仍然在西汉王朝版图的基础上撰写了《水经注》这部不朽名著。他在政治地理上的这种思想，对于后世我国领土的完整，疆域的稳定，民族的团结等方面，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从地理学思想史的角度说，“地理大交流”的时代，确是我国一个值得骄傲的时代。

当然，历史的车轮总是不断前进的，欧洲从11世纪以后结束了它的黑暗时代，接着就迎来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从而促成了新航路的探索而发生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场面。在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上，另一个波澜壮阔的飞跃时代终于在欧洲出现。而象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李特尔（Karl Ritter）这样划时代的地理学家在这个时代中应运而生。就是这些地理学家，他们把古典的地理学，引向现代科学的地理学。他们在地理学思想史中的崇高地位，当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由于历来一切地理学思想史、百科全书和地理辞典等，对他们都有详细的介绍，我在这里当然不必赘述了。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地理学思想史》，在我国，以专著形式撰写的《地理学思想史》，还没有人作过尝试。建国以后，曾经出版过几种《地理学史》，但是由于内容还没有较多地涉及地理学理论体系的产生、形成与发展过程，因此，这类著作并不能代替《地理学思想史》。在国外，《地理学思想史》一类的书籍不能说少，但经过汉译以后在中国出版的却未曾见。1978年3月，中国地理学会假上海浦江饭店举行了一次世界地理工作会议。几位年长的教授和我住在附近的上海大厦。商务印书馆的陈江先生带来了美国鲍勃斯——梅里尔出版公司1972年出版的，由普雷斯頓·詹姆斯（Preston E. James）撰写的《万千世界——地理学思想史》（All Possible World,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一书的原书，到会上征求译者。他把此书交给了李旭旦教授，希望他

承担翻译任务。我和李先生隔房而居，一个晚上，李先生到我房中征求我的意见，并把此书留在我的房中，让我浏览了整个晚上。我觉得此书资料丰富，体系完整，主要的缺点是有关中国的资料太少，其实是一本《西方地理学思想史》。但是对于一位美国作者，要求他搜罗大量的中国资料是不现实的，何况我们自己还没有出版过这样的专著。所以次日一早，我就力劝李先生承担此书的翻译任务。李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勤奋不懈的地理学家，虽然工作十分忙碌，他终于挤出时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完成了这部40万字巨著的翻译任务。此书的责任编辑陈江先生也尽了最大的努力，让此书在1983年初就与中国读者见面。李先生于是年1月3日将此书寄赠给我，并在信中说：“我译的詹姆斯的《地理学思想史》一书总算问世了，北京商务寄给我4册，但各地新华书店仍未见书，兹先赠您一册，以资留念”（我把此信粘贴在李先生签名赠送的此书扉页上，作为我对这位我所尊敬的已故地理学界前辈的永恒纪念）。我曾经用一个晚上浏览过此书原本，李先生的译本寄我以后，又花了三、四天时间读完了此书，我觉得在中国没有自己的《地理学思想史》以前，此书在地理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部门上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的空白，李旭旦教授的辛勤劳动是厥功甚伟的。但是，按照中国读者的要求，此书显然存在着较大的缺点。简单地说，就是本书缺乏中国的材料，缺乏中国气息。中国如同米仓教授所说，是个在中世纪出现过全世界最伟大的地理学家的国家，但是在詹姆斯的书中，却看不到中国在地理学思想史上应有的位置。因此，本书不仅不能使中国读者感到满意，作为一本完整的《地理学思想史》，也是存在着较大缺陷的。正如李先生在卷首《詹姆斯著〈地理学思想史〉述评》中所指出的：

总的说来，詹姆斯的《地理学思想史》是一部对任何地理专业工作者来说都是值得一读的书。但是，我们也应当指出此书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和不足之处，首先，本书对西方

地理学的介绍仍然过于偏重，尤其是有关美国的篇幅偏多。对其他各国，尤其是对亚、非、拉美各国的记载，不免相形见绌。”

不过，平心而论，詹姆斯的著作中所存在的这种缺陷，责任并不全在作者。作者是根据历来学术界提供的资料写作此书的，但在中国，有关地理学思想史的专著和论文是那样的稀见，要一位外国学者到汉文古籍的零星记载中去搜集资料，这显然是过高的要求。何况，从全书内容来看，作者似乎也经过一番努力，希望写入一些中国的材料，当然，作者的努力并不成功，此书中有中国多数材料，都是挂一漏万的。作者在第一篇《古典时期》第二章《古典地理学的发轫》中，写下了“古代中国对地理学的研究是很重视的”（中译本第17页）几句话，在第三章《中世纪的地理学》中，也写下了“中国人的成就最为重要”（中译本第51—52页）这样小小的一段，但内容都是空洞无物的。作者其实并不清楚，他在书内曾经提及的书名如《禹贡》和《穆天子传》之类，不仅在著作时间上并不晚于他用大量篇幅叙述的古代希腊，在价值上也并不逊于作者大加强调的《伊利亚特》和《奥特赛》。在有关中世纪的叙述中，作者在《中国的地理学》篇下，用《地理著作》（实际一种著作的具体名称也未曾提出）、《中国人的探险》和《地图学》三个小标题，简单地描述了中国在这个时期的地理学发展，内容也相当贫乏。詹姆斯在这方面的孤陋寡闻毫不奇怪，因为从他引及的书名中可以看到，他所描述的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情况，主要是从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技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一书中引来。他虽然根据李约瑟的著作，写下了“中国地理学的研究作为其广博学术传统的一部分，那时就有了长足进步，超过基督教欧洲所知道的任何东西”（中译本第51—52页）的话，但其实他并不知道，中国在这段时期出现过世界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中国的地理学发展曾经独步世界。在第二篇《近代时期》中，作者介

绍了不少国家的地理学，如德国、法国、英国、苏联，特别是美国，占了最大的篇幅。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大国，却只在《中国的地理学》这个标题下，用《中国的英美流派》和《共产党中国的地理学》两个小标题，作了与其他国家很不相称的简单叙述。李旭旦教授在卷首《述评》中已经指出：“詹姆斯对于解放后新中国地理学的评述是不全面的，有些问题很可商榷。”

当然，詹姆斯在这方面所存在的缺点，我们自己也并非毫无责任。例如，他对新中国地理学评述中所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当然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这是无法强求的；另一方面，显然是由于资料的贫乏。几乎30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国家处于封闭状态，这样就不能指责外国学者为什么不多写些中国的东西，这样的指责，或许不够公道。所以，我十分同意李先生在卷首《述评》中对此书的总的评价：“不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本书仍然不失为一部很可参考的书，它是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地理学思想发展过程的一本新著，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尽管此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是对于中国地理学界来说，毕竟只有过渡的意义。自从李先生在1983年初把此书寄赠给我之日起，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此书中译本的出版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对于过去未曾触及这个课题的人来说，此书算是一种启蒙，它可以在地理学界普及地理学思想史的知识，对于过去关心这个课题的人来说，此书就是一种借鉴，它可以启发我们的地理学界，动手写作一部我们自己的《地理学思想史》，使内容达到古今贯通，中外兼顾，既不故步自封，也不数典忘祖。

现在，令人欣慰的是，詹姆斯的著作在我国出版以后不到五年，我就读到了刘盛佳先生著作的《地理学思想史》的书稿，而且和我几年来的希望一样，这部书稿的内容，既包罗外国信息，又符合中国实际。著者对于地理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时期划分，著作和人物评价等诸方面，都下过很大的功夫，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而最后一篇《发展时期的中国地理学》，把我国当代的人文地

理学和自然地理以及各个分支的发展，作了全面而详细的介绍。资料丰富，内容完备，引证严密，论述精辟。在历来出版的《地理学思想史》中，中国地理学第一次得到如此详尽的介绍和评述，这不仅符合中国读者的要求，也同样符合国外读者的要求，因为除了此书以外，人们从来无法在同类的书籍中，获得有关中国地理学思想史的如此丰富的资料。

刘盛佳先生是一位刻苦治学，著述宏富的中年学者，近年以来，在历史地理学、地理学史、地名学等领域的研究中，成果丰硕，已经为地理学界所熟知。而《地理学思想史》的出版，必将引起学术界的更大关注。我作为本书的最早读者，受著者之嘱，欣然命笔，在卷首写下这样一些拉杂的体会，既借此表示我对此书出版的祝贺，也用以向读者们陈述我对此书的推赞。

陈 桥 驿

1988年11月于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

前言

1982年我系招收人文地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邀请我讲授《地理学思想史》一课。时值我脱产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湖北省卷》的编纂工作；1985年春季开始讲授此课，此时我正在对词典进行一审、二审工作，又值老病复发，在院治疗，为了按时完成两样工作任务，只好把病房当成研究室，每天除治疗外，坚持工作8小时，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地理学思想史》是一门有关地理学理论体系产生、形成、发展过程的研究学科，在我国未曾有人系统地讲授过这门课程，也没有这方面的学术专著。1982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 P. E. James 的《地理学思想史》，A. Heitner 的《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R. Hartshorne 的《地理学性质的透视》，P. Pedech 的《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和 R. E. Dickinson 的《近代地理学创建人》等中译本。因为这些书出版太晚，购买这些书又相当困难；并且这些著作皆为欧美学者所撰，对于欧美以外的地理学的发展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中国古代有着人类最光辉的地理学成就，没有得到适当反映，这些促使我萌发了撰写有中国特色的《地理学思想史》。尽管时间急迫，加之涉及范围十分广泛，难度很大，我并未知难而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校系领导十分支持，特别是邓宗琦副校长和邓先瑞系主任亲自审阅了前两篇的手稿，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国著名方志学家朱士嘉教授和著名地图学家万遇贤教授也对有关篇章进行了审阅。全稿撰完后，我校科研处将书稿寄请著名地理学家、南京师范大学李旭旦教授审阅鉴定，恰值此时旭旦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传来，使我失去了得到他老人家教诲的机会，十分悲痛；书稿又寄返我校，校科研处再转请历史地理学家、杭州大学陈桥驿教授审阅鉴定，

桥驿先生百忙之中，耗费大量时间对全书进行了审阅修改，使我十分感激！让我以虔诚之心，向给本书编著以指教和帮助的诸位领导、前辈和同志们以深深的谢意！校出版社在编辑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使本书得以出版，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與阿兵談國味共月入華中》事从氣源蘇聯。年劉盛佳與張華聯
蘇五蘇相說，斯此蘇相於李春平2801；許工暴融怕《慕容非陳
了快，後給劉一為，其是蘇裝蘇又，許工中1987年3月20日而故
，後食給劉天長，室張和蘇世氣融林又，表許許工蘇蘇蘇蘇蘇
。時而蘇下其蘇蘇其，知小8許工林